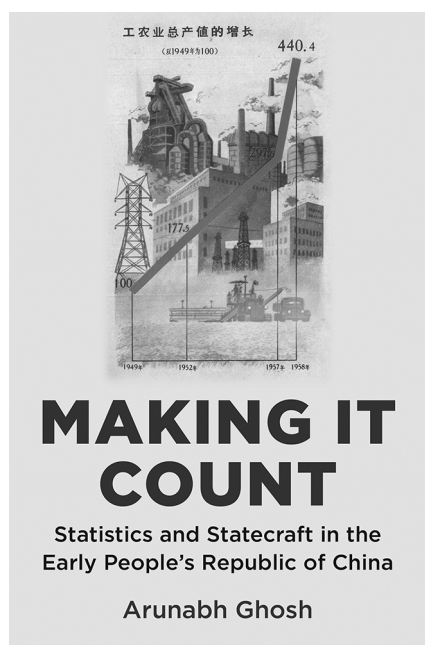


「數字中國」與國家能力建設

——評 Arunabh Ghosh, *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王宜揚

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西方學習社會科學的學者以及他們所推崇的學術話語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合法性被否認。在人民解放軍一路高歌猛進，大量新解放區誕生的同時，新的矛盾也隨之暴露在這個國家的新執政者面前。



Arunabh Ghosh, *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在黃仁宇的技術史觀中，「數目字管理」被視為現代化的實質與同義詞^①。儘管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多有模糊之處，但不可否認的是，試圖通過作為一種技術手段的統計來了解中國並推動其現代化進程的努力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從未間斷。1920至30年代蓬勃發展的社會調查運動被視作改造中國的社會運動的一部分，眾多在英美體系之下接受理論和方法論訓練的社會科學家使用統計學方法開展實證性社會調查，取得了對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極為豐富的調查材料^②。然而，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西方學習社會科學的學者以及他們所推崇的學術話語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合法性被否認。在人民解放軍一路高歌猛進，大量新解放區誕生的同時，新的矛盾也隨之暴露在這個國家的新執政者面前：

* 感謝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董國強教授對本文的指導。

此前中國共產黨的治理經驗多來自於老解放區，在事實上缺乏對於中國大部分地區基本情況的了解；對來源於「英美資產階級」的社會調查方法採取全盤否認的態度，卻缺乏有效了解社會經濟概況的替代體制；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願望，又使新生的共和國必然需要大量數據作為政策制訂的支撐。統計作為收集數據的技術，其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於是在共和國早期重新被提及。

在對共和國早期歷史的通常理解中，毛澤東時代的統計數據往往被視作缺乏準確性和科學性的政治工具：基層官員出於自身前途與高層官員出於統治合法性的需要，都傾向於將數據美化，以至於使其失去反映真實社會狀況的價值。哈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郭旭光(Arunabh Ghosh)的《算數：共和國早期的統計學與國家治理》(*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引用只註頁碼)關注了統計學這一高度專業化的技術領域，討論在共和國早期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的國家能力建設問題。作者聚焦於新政權建立的技術方法與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紐帶，並將其置於冷戰時期中國對外關係的大背景下，這一見微知著的視角為理解1950年代中國提供了嶄新的觀察。

一 內容概述

本書指出了三種過去曾經影響中國統計工作的統計方法：將統

計學視作一門獨立於數學的社會科學、以蘇聯範式為代表的窮舉法(exhaustive)，以英美數理統計理論為核心的隨機抽樣(stochastic)，以及毛澤東早年所提倡並在延安時期被運用於根據地調查的民族志式(ethnographic)階級分析社會調查方法(頁5)。本書強調特定的統計方法對數據收集和分析的速度與質量的影響，即方法的選取與統計體系總體效能發揮間的關係。

全書除引言與結論外，共分為三個部分、七個章節。第一部分(第二至四章)重點考察了1949年前後中國統計工作存在的連續性：儘管全國性統計機構在1950年代初才得以建立，共產黨執政者早在1948年就於東北地區建立了區域性統計機構並展開統計活動，奠定遵循蘇聯社會主義統計工作範式的統計體系，深刻影響共和國早期的統計實踐與人才培養。第二部分(第五至七章)着重討論了共和國統計工作的社會主義性質，並指出統計方法與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繫如何建立起來；在面對治理所需人才的匱乏時，新政權又是如何運用各種方式培養從基層到高層的專業化統計工作者，並保持他們的熱情。第三部分(第七至八章)展示了一個被既往研究所忽視的維度：在195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受到挑戰時，中國的統計學家試圖將學習印度作為彌補蘇聯式統計體系內在缺陷的替代方案。儘管中印雙方進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但很快就被政治運動所中斷；大躍進使得「群眾科學」的話語席捲了統計學領域，在對業已制度化的統計體系造成巨大衝擊的

郭旭光的《算數》關注了統計學這一高度專業化的技術領域，討論在共和國早期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的國家能力建設問題。作者聚焦於新政權建立的技術方法與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紐帶，並將其置於冷戰時期中國對外關係的大背景下。

本書關注兩個重點內容：作為國家治理工具的統計與作為意識形態的統計。統計活動既關乎國家能力建設，也與合法性問題密切相關。一方面，提升國家能力的考慮被置於優先位置；另一方面，如何賦予統計以合法性地位，亦需要被考慮。

同時，一場「統計大躍進」也隨之帶來統計方法的變化。

作為「第一部毛澤東時代中國統計學發展的歷史研究」（頁8），本書展現了一個通常視野之外的「數字中國」形象：與人們對1950年代中國國家治理低效率的既定印象不同，新政權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全國統計體系，並試圖藉此為國家的經濟計劃提供技術支持。然而，龐大的治理規模與過長的上報鏈條，使得對技術與現代化連結的想像被淹沒在大量瑣碎繁複的數字與表格之中。

下文將圍繞本書所關注的兩個重點內容展開討論：作為國家治理工具的統計與作為意識形態的統計（頁10）。作者指出，統計活動既關乎國家能力建設，也與合法性問題密切相關（頁166）。一方面，作為一個經歷了長期戰爭後建立的新生國家，共和國面臨着嚴重的物質匱乏，關於恢復經濟生產、提升國家能力的考慮被置於優先位置；另一方面，特殊的國際冷戰環境使得中共必須直面自身在意識形態上的承諾（頁3、15-16），如何賦予統計這種與社會主義價值所推崇的「生產浪漫」似乎有些格格不入的非生產的技術工作以合法性地位，成為另一個需要被考慮的問題（頁202-204）。國家能力的困局和意識形態的考量，共同影響了新生共和國統計工作的路徑選擇和發展進程。

二 國家基礎性權力建設

此前大量關於1950年代中國的研究將目光聚焦於這一時期歷史

的複雜性，在破除以時間節點為界的二分視角的同時，探討1949年對於共和國史乃至近現代中國史的意義究竟何在；其中一個重要問題便是對1949年後中國轉向共產主義統治的「斷裂與延續」的討論（頁8-9）。本書將這一「斷裂與延續」的視角放置於更複雜的時間與空間維度，以更好地理解新政權的國家能力建設之路。作者指出1950年前後統計機構、統計活動開展與統計教育變化在時間和空間層面的多樣性（頁19-20），為認識新生共和國邁向社會主義的努力提供了基於統計工作視角的獨特觀察。

在探討共和國的國家能力建設問題時，作者借鑒了曼（Michael Mann）的國家能力觀點：國家基礎性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作為一種統治者在其領土範圍內有效施行公共政策的能力，與專制性權力（despotic power）相對應，是現代工業社會的重要特徵。作者將統計視作這一權力的有力分析對象，由此探究共和國如何在統計領域開展自身的基礎性權力建設（頁179）。

對於新生的共和國而言，雖然中共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已經獲得社會主要階層的擁護，但在確立邁向現代社會的目標之前，仍缺乏從社會汲取資源並實行長效規管的治理能力。統計不僅為國家進行資源汲取和社會規管提供前提條件，對於將社會主義視為理想的新政權而言，集中的統計體系對中央計劃經濟的運行更是尤為重要。與將調查數據視為理解社會的手段西方社會學及其社會調查方法取向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將統計視為一種為政策制訂提供參考的

重要工具，其對及時性的重視有時甚至壓倒了數據的準確性和全面性要求（頁165）。國家統計局局長薛暮橋在1957年9月第六屆全國統計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統計資料固然要求高度的正確性，但並不是所有的資料都要求高度正確；領導機構為了解情況、研究問題、決定政策，常常需要及時取得一些參考資料，這種資料不要求全面性和高度正確，但必須及時供應^③。如何能夠建立一個標準化的全國性機構，監督、協調並集中使用和發布數據信息，正是新執政者建立全國統計體系時所面臨的關鍵問題（頁2）。

李卓敏等此前關注共和國早期統計工作的研究者認為，在新政權建立的前三年（1949-1951）中，全國範圍的統計體系並未得到發展，因而主要聚焦在1952年前後全國性統計機構建立的問題^④。對於這一觀點，本書作者着重強調中共在東北地區的早期統計工作對共和國成立後全國統計體系建立所起到的模範作用和提供的重要經驗（頁27）。在東北地區開展的統計活動，其主要目的是評估該地區的經濟狀況。1948年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統計組成立，並於1950年發展成為東北統計局，為此後全面的統計調查奠下基礎。這一區域性統計體系受到蘇聯範式的深刻影響：這種以廣泛化、整體性與客觀性等為基本特徵的統計活動，奉行「只有把一切計算在內，才能對社會現實產生客觀認識」的原則，被視作一種「新型正規化的統計工作」，也體現出新執政者對於治理「科學」的理解——

由層層上報的統計數據構建成「大廈」，並從其中獲得對社會的真實認知（頁45-47）。新政權希望通過這種與資本主義統計學相區別的社會主義統計體系，幫助中國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

在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前三年並沒有設立一個全國性機構統一指導統計工作，當時統計事務主要由作為政府部門的各地財政經濟委員會和統計處/科進行協調。1949年7月，由陳雲領導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作為國家一級機構處理來自地方和各部委的統計報告。此後不久，建立全國統計體系的任務被正式提上日程。在1951年7月第一屆全國統計工作會議上，時任東北統計局局長、經濟學家王思華提議成立國家層級的統計機構，統一領導全國統計工作；隨後國家統計局成立，薛暮橋在1952年8月被任命為首任局長（頁130-31）。1952年12月第二屆全國統計工作會議提出了在各個行政層級建立相應的統計部門、形成全國性統一網絡的任務，一個複雜的「雙軌制」制度由此建立：基層單位將數據分別上報至縣一級統計局和業務主管部門；所收集的數據信息通過統計系統和業務系統兩條路徑，經由縣一級、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層層上報至國家統計局和相應的業務主管部門；同時，各級的業務部門也對同級統計部門的數據進行查核（頁149-51）。新執政者依靠國家統計局及其下屬機構，通過基於完整枚舉的定期報告系統收集和整理數據，並對數據進行研究以提供予相關政府部門使用（頁138-39）。

與將調查數據視為理解社會的手段的西方社會學及其社會調查方法取向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將統計視為一種為政策制訂提供參考的重要工具，其對及時性的重視有時甚至壓倒了數據的準確性和全面性要求。

對於迫切希望改造統計理論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新政權而言，老一代統計學家具備着相互矛盾的雙重身份：在意識形態上，他們被視作社會主義統計學的敵人；對於統戰工作而言，他們又是中共所珍視的統戰對象。

然而，由於標準化被視作社會主義統計學的關鍵特徵，大量的報告和統計表格充斥於各級統計工作，隨之暴露出統計數據重複、混亂和報告延遲的弊病，以至於新政權不得不作出大量指示以糾正統計調查中的混沌現象。南京統計局1957年對一家玻璃廠和一家製造廠的調查顯示，工廠每年形成的報告多達數百份，其中近半數用於內部生產，而發往外部的報告中也僅有不到半數提交至統計局，不同用途的統計報告在實質上構成了數據的重複與冗贅（頁145）。此外，各地區條件差異也導致「統一領導，分級管理」（頁128）的標準化的數據收集程序極難實現，計劃的理想性與現實的複雜性之間的矛盾，橫互在新政權試圖建立自上而下的國家經濟管理結構的努力之中。

在對統計體系建立的空間維度觀察之外，本書還特別強調了另外一種「斷裂與延續」的觀點：在走向計劃經濟的道路上，事實上共和國統計在實踐方面的社會主義轉型先於理論。在1949年以前，金國寶被視作中國最著名的統計學家，他所編寫的統計學教科書《統計學大綱》出版了多個版本，在學界具有極大影響力。在共和國早期，作為一種教育和學術話語的資本主義統計學得以短暫延續，其表現為老一代統計學家所編寫的統計學教科書依然被廣泛使用——由於這一代在統計領域卓有建樹的統計學家往往受到西方統計學的影響，因此將統計學視作一門價值無涉的普世科學（頁89-90）。而1949年的歷史斷裂，則意味着這一為當時統計學家

所熟悉的理論範式不再適用於新政權的價值要求，而轉向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尋求一種符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統計範式，並確立其在共和國的主導地位。

這批解放前的統計學家所推崇的理論與方法論成為了新政權尋求統計學「新理解」道路上的最大阻礙。但問題並不止於此，對於迫切希望改造統計理論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新政權而言，這些統計學家還具備着相互矛盾的雙重身份：在意識形態上，追隨英美統計理論的他們被視作社會主義統計學的敵人；而對於統戰工作而言，這批擁有新政權急需的知識和技能的高級知識份子又是中共所珍視的統戰對象（頁98）。在新政權建立初期，大學等場域仍為他們的學術討論保留了一方空間，而隨着知識份子改造和高等院校院系調整的展開，中共力圖在教育和學術領域確立黨的一元化領導地位。對統計學家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知識份子改造的主要範式，通過讓曾經接受英美統計訓練的統計學家在學術期刊上進行有限度的自我批評，在批判資本主義統計學缺陷的同時強調社會主義統計學的社會科學本質，使他們成為擁護新政權並為國家建設繼續做出貢獻的社會主義統計工作者（頁98-102）。

與解放前學科權威確立方式更多出於與學科相關的利益群體在知識場域的競逐不同，共和國早期社會主義統計學的權威確立方式在本質上來源於國家權力。1952年，國家統計局的建立與中國人民大學被選為歸類於社會科學的統計學的

主要培訓基地，標示着新執政者努力通過制度化的方式應對既往資本主義統計學的持續影響和重大挑戰（頁101）。隨着這種由國家力量主導、自上而下的學科形態變革的完成與正式的全國性統計機構的成立，蘇聯式社會主義統計學教科書大量出版與愈來愈多人才接受了社會主義統計學的專門訓練，社會主義統計學的學科權威得以逐步確立（頁108、187）。

全國統計體系的確立不意味着這一路程到達了終點，共和國的統計工作面臨着一個更複雜的問題：在培養「紅專並重」的新幹部的社會主義信念的同時，卻無法迴避統計工作作為一種非生產的技術型職業的事實。當中共從革命黨成為執政黨後，力圖塑造一種相對於革命年代「革命英雄」的新的「生產英雄」，使民眾的熱情從革命事業轉移到國家建設上來（頁202）。從延安時期開始，樹立勞動英模，發揮其典型示範作用以動員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一直是中共開展群眾動員的重要方式，對毛澤東時代勞模塑造的研究也多集中於革命和生產這兩個領域^⑥。本書探討了對統計工作者這一以往被忽略的技術工作的勞模塑造問題：在大環境對非生產工作的忽視與統計工作對國家經濟建設的重要性的矛盾之中，對於如何動員統計工作者的積極性，使之發揮其自身的重要作用，新政權一方面強調統計工作的「革命性」與「行行出狀元」的基本價值，一方面通過文學與藝術將數字與統計浪漫化，通過詩化的語言構建統計工作與生產價值間的連結（頁204）。例如，

作者引述了會計馮緝熙對統計工作文學化的讚頌：「每當我作完一張統計表的時候，我就像農民在田野裏看到金黃的麥穗那樣愉快，像煉鋼工人看見馬丁爐煉出的鋼水那樣興奮，像美術家作完一幅美麗的巨畫那樣歡欣。」（頁205）統計工作者與其他生產領域的勞模一樣，被賦予了「革命」的話語，在集體主義的價值之下被塑造為統計工作勞模。

以統計為典型的共和國國家能力建設之路展現出時間與空間、形式與實質的斷裂與延續。藉由統計工作的地方性試點、全國統計體系的確立、對統計學科和統計教育的改造以及對統計工作者熱情的激發，統計工作不僅為新政權國家能力的擴展提供了基礎性條件，也融合成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 統計方法與意識形態

作為國家基礎性權力重要內容的統計，除了與共和國早期物質匱乏的緊迫性密切相關，更多地來源於意識形態的需要——這是本書所關注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既然在社會主義國家，價值無涉的普世科學被否認，在冷戰的影響之下，統計學自然也帶有意識形態色彩，並作出了「西方」與「非西方」的區分。在討論統計與共和國基礎性權力構建關係的同時，本書將視野回歸到作為技術和政治的統計工作的二元屬性之上，討論統計學的學科屬性與具體統計方法的意識形態意涵。

本書探討了對統計工作者這一以往被忽略的技術工作的勞模塑造問題。統計工作者與其他生產領域的勞模一樣，被賦予了「革命」的話語，在集體主義的價值之下被塑造為統計工作勞模。

在以時間順序展開敘述的縱向主軸外，「意識形態—統計方法—國家能力」的線索貫穿全書，其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在共和國早期歷史上統計體系的確立過程及其內容，更重要的是將其置於更高層次的國家治理與制度化的維度。

對於二十世紀初期在西方影響下形成的社會科學而言，既有的觀點多將1949年視為其學科發展的斷裂，其自身學科史的研究也多遵循冷戰範式的二分視角(頁8-9)。大量關於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則更多圍繞於自然科學領域^⑥。同時，在科技史研究中，「統計學」多被視作「數理統計」的同義詞，鮮少有學者關注1950年代前期統計學的學科屬性之爭(頁11-12、16)。本書提供了一個技術手段與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相連接的觀察維度，關注了新政權如何賦予技術領域及其學科以意識形態合法性，以及基於假設中立、價值無涉的統計學領域如何成為關於社會現實本質的基本理論的鬥爭場所(頁283)。

在本書中，作者使用了斯科特(James C. Scott)「國家的視角」的類似表述(頁10)，拋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ocialist state)究竟意味着甚麼」這一關鍵問題。在以時間順序展開敘述的縱向主軸外，「意識形態—統計方法—國家能力」的線索同樣貫穿全書，其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在共和國早期歷史上統計體系的確立過程及其內容，更重要的是將其置於更高層次的國家治理與制度化的維度，圍繞着這一鮮明主線討論若干有關統計工作與國家治理能力的具體問題：在不同階段，為甚麼某種方法能夠在統計工作中佔據主導地位？這種統計方法的選擇提供了怎樣的國家基礎性權力，又制約了哪些能力的發揮？

貫穿二十世紀的數字實證主義潮流將發展與數字化緊緊相連，數

字被視作一種理性方法的同時，也成為了政治競爭的重要工具。對於中國的統計體系發展而言，蘇聯所發揮的影響是顯著的。在作為社會科學或「階級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之中，統計的學術導向被大大淡化，成為一種規劃國民經濟發展的實用工具。以概率論為代表的數理統計研究從統計學領域被放逐至作為自然科學範疇的數學系，導致了統計理論與實踐的分離；在社會主義的話語之下，統計學成為一門徹徹底底的獨立社會科學，以「非數學但具有普遍性的『一般』統計數據」為定位(頁69)。統計學的社會科學屬性藉由高等教育的學科體系被清晰劃定，而作為一種付諸實踐並需要考慮實際效果的統計方法，卻始終在爭論中前行。儘管在某個時期中某種特定的方法能夠佔據方法論上的主導地位，但這種來源於政治意識形態賦權的技術合法性，不僅會因為其在實際運用中的效率低下而遭到質疑與否認，也往往會在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的衝擊下被擱置一旁甚至被完全顛覆。

在共和國早期，定期報告系統主導了共和國統計工作，也成為了新政權早期計劃經濟體制運轉的支柱。儘管其不僅產生了過度或重複制訂的統計報告，也面臨着會計與統計工作之間的接軌困難等嚴重問題，但統計體系仍成為了政策制訂的重要參考工具。作者以北京為例，說明了統計體系在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即使當地統計工作問題眾多，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市統計局依然每年上呈了經

濟發展和計劃執行的年度報告，提供了工程完成率、經濟環境概況等重要數據（頁164-65）。

作者強調了中蘇關係對中國統計體系的影響，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華援助的蘇聯專家在中國統計體系的建立中所發揮的作用，二是蘇聯國內對統計學學術性質的界定深刻影響了中國對統計學的定義。沈志華關於在華蘇聯專家的研究將1948至1960年的十二年劃分為四個階段，展現了中蘇合作由緊密走向最終破裂的全過程^⑦。在中蘇學術交流日趨制度化之後，蘇聯專家不僅將本國對於統計學的獨特理解帶至中國，也影響了中國統計實踐的具體方法。然而，儘管蘇聯範式深刻影響了共和國早期統計體系的建設，但也不能就此將統計工作的路徑選擇視作純粹意識形態主導的結果。本書對已有的冷戰「中心（蘇聯/美國）—外圍」研究模式進行了修正，關注了中國統計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的實用主義傾向。作者主張重新認識1950年代蘇聯的對華援助：一方面，中國對蘇聯的學習並非總是不加批判的；另一方面，儘管1956年蘇共二十大未對中蘇雙方的專家政策產生根本性影響，但在統計領域，蘇聯範式發揮的作用開始減弱，其經驗在中國的實踐中逐漸被證明是不切實際的（頁217-18），中國開始在冷戰兩極的統計範式之外尋找新的方法。

在統計工作的具體開展過程中，中國統計學家逐漸認識到社會主義統計學的局限性。現有定期報告系統的繁複瑣碎極大降低中國統

計體系的運行效率，特別是在農業統計的準確性面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中國統計學家開始將尋求解決方案的目光轉向了蘇聯之外。作為印度裔學者，作者講述了一段被學界遺忘的中印統計學家之間的交流往事。隨着對外關係和國內政治風向的變化，中蘇關係的演變強烈影響着中國對蘇聯範式的態度，也使得當時中國在「中心—外圍」模式主導的科學網絡之外，採取更開放的態度向更廣闊的外部世界學習（頁215）。

1955年4月萬隆會議後，中國與亞非拉國家展開了更為持久的交流，當時擁有世界領先的統計技術的印度開始進入中國高層領導人和統計工作者的視野之中。1956年，王思華、戴世光與其他幾位中國統計學家訪問位於加爾各答的印度統計研究所（Indian Statistic Institute），就數理統計及其應用，特別是大型隨機抽樣等先進統計方法向印度同行學習。次年，印度著名統計學家馬哈拉諾比斯（Prasanta C. Mahalanobis）來華，與中國高層領導人與統計工作者展開交流。在與印度的交流中，中國統計學家提出將「較經濟，較快，又較正確」的抽樣調查大規模推廣至全國展開專門的科學調查的主張（頁223-28）。這一短暫交流的努力實際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共和國統計體系儘管仍有待商榷，但中印之間的統計工作交流在事實上基於實用主義的信念，意味着新政權在「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較為寬鬆的政治氣氛之中擱置了意識形態的偏

中印之間的統計工作交流在事實上基於實用主義的信念，意味着新政權在「雙百」運動較為寬鬆的政治氣氛之中擱置了意識形態的偏見，任何「科學的」統計方法的使用都應當被視作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作者對「大躍進源於統計體系的崩潰」的觀點提出了質疑。本書關注了在大躍進時期統計體系內部的活動所發生的變化，其目光不再僅僅聚焦於高層領導人對統計數據的知情與否，而是探究當時「統計數據究竟發生了甚麼」這一更深層次的問題。

見，任何「科學的」統計方法的使用都應當被視作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段中印交流往事，也呈現出1950年代意識形態與知識領域間單向度聯繫之外的另一種可能。

基於對共和國統計發展的總體性研究，作者進而對一種學界認為「大躍進源於統計體系的崩潰」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大量關於大躍進期間經濟崩潰的研究都討論了中共高層信息獲取的問題：對於地方所發生的一切，毛澤東和其他高層領導人可能知道或確實知道多少（頁250-52）？這個問題事實上與他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獲得可靠數據有關。本書關注了大躍進時期統計體系內部的活動所發生的變化，其目光不再僅僅聚焦於高層領導人對統計數據的知情與否，而是探究「統計數據究竟發生了甚麼」這一更深層次的問題。

作者着力於解釋，大躍進時期地方官員受制於政治運動壓力對統計數據（特別是農業數據）的極度誇大，並非是造成國家能力瀕臨崩潰的主因，真正影響統計體系效能的是統計活動的具體形式徹底轉變造成的體系無能。隨着大躍進開始，此前被視作「先進經驗」的蘇聯範式成為了教條主義的典型，而貫穿共和國前十年統計工作的社會主義統計學與英美數理統計的方法論爭論也很快讓位於群眾科學的反專家話語。不僅中印統計學家之間的短暫交流被打斷，此前所建立的社會主義統計學的定期報告系統同樣也被避免使用，從根本上顛覆了

業已確立的自上而下的常規統計體系，這一統計方法的變化意味着作為計劃經濟支柱的統計體系的基礎性權力迅速下降。當群眾科學中民族志式的典型抽樣社會調查（即找出在關鍵問題和政策措施上具有示範作用的典型，頁252，註9）被廣泛運用，並以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代表的階級分析社會調查方法作為基礎之後，這種建國後一度在統計領域中被忽略的方法論被賦予了正統的地位。在大躍進中，儘管定期報告的方式沒有被完全否認和走向「崩潰」，但其在狂熱的政治氣氛之下被逐漸邊緣化，而典型調查在統計方法論中的地位被大大提高了。

換言之，大躍進時期的統計數據並未在實際上崩潰，但統計活動的轉變直接影響了其所生成的數據的質量。這種意識形態話語導致的統計活動形式變化，意味着政治運動對國家正常運轉所依賴的基本組織架構和基礎性權力的巨大衝擊。作者拒絕了既往研究中所認為的「大躍進源於統計體系的崩潰」這一還原論觀點，並提出了一種更為新穎的審視共和國早期歷史分界的主張，即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應該被放置於更長的歷史軌道上進行觀察。如何理解在1950年代後期共和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突然轉向，作者認為，在直接的政治背景之外，也需要將其置於共和國前十年的統計理論和方法論爭之中。

作者從統計工作的特徵考察大躍進的生成、發展及其後果，儘管所涉筆墨不多，但問題意識鮮明。

統計工作是國家常規治理體系的一部分，所依靠的是基於國家機構自上而下的滲透與協調。大躍進在造成了異常的政治氛圍的同時，也使統計工作進入了非常規狀態，儘管國家統計局在政治氣候的鉅變中仍努力堅持着專業知識，呼籲在日益高漲的群眾運動中發揮統計工作者的專業權威，但這一平衡政治與專業化的努力在大躍進完全政治化之後事實上已完全不可能。因此，這一變化不應被歸結為統計體系的失敗，而是在政治運動的壓力之下統計方法改變所帶來的直接後果。

四 小結

本書基於共和國早期的統計工作展開，在實質上則討論了當時國家能力與經濟發展的總體格局。書中嶄新的觀察視角和全面的觀點為理解 1950 年代中國提供了更加客觀且豐富的維度。與對於社會主義新政權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和有效性的既定印象不同，本書展示了共和國早期歷史上統計工作複雜的真實面貌，其所涉及的內容之廣泛，也使得仍有眾多具體問題值得進行更深入的考察。例如，本書重點關注了經濟領域的統計工作實踐的轉變，但統計方法論的變化也深刻影響了社會統計和社會調查。在否認了 1949 年以前社會科學研究理論和方法論的有效性與合法性的同時，對於有志改造社會的新政權而言，執政者是否找到了獲取社會信息的替代方案？集體主義的價值和

話語，是否真的意味着關於社會和個人生活的信息和偏好逐漸遠離了執政者的視野？在這一統計方法論轉型的背景之下，若能具體探究新政權「如何理解社會」這一問題，也許能夠為理解 1950 年代中國的社會變革提供新維度的觀察。

註釋

- ① 黃仁宇：〈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載《放寬歷史的視野》（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127。
- ② 李景漢：《實地社會調查方法》（北京：星雲堂書店，1933），頁 25-28。
- ③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統計工作的初步經驗和今後任務——國家統計局薛暮橋局長在第六屆全國統計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統計工作》，1957 年第 21 期，頁 1。
- ④ Choh-Ming Li, "Communist China's Statistical System: 1949-57",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no. 2 (1961): 499-517; Leo A. Orleans, "Chinese Statistics: The Impossible Dream", *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28, no. 2 (1974): 47-52.
- ⑤ 岳謙厚、劉威：〈戰時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模運動〉，《安徽史學》，2011 年第 1 期，頁 83。
- ⑥ 施雲燕：〈中國科技史研究的熱點及趨勢分析——基於近 50 年 ISIS 文獻目錄的計量分析〉，《中國科技史雜誌》，2019 年第 1 期，頁 117。
- ⑦ 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 18-19。

在否認了 1949 年以前社會科學研究理論和方法論的有效性與合法性的同時，執政者是否找到了獲取社會信息的替代方案？集體主義的價值和話語，是否真的意味着關於社會和個人生活的信息和偏好逐漸遠離了執政者的視野？

王宜揚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政治學系本科生